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8月16日 (第243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约瑟夫·奈：美国应制定战略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中国的崛起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制定一项新的战略来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以允许在基于规则的体系内开展合作和竞争。

中美关系

兰德公司建议美制定在太空威慑中国的战略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近日登载该智库政策分析师克里斯塔·朗格兰德 (Krista Langeland) 等执笔的报告称，美国的天基能力是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而中国可能会利用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弱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在太空“威慑”中国是美国国防部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优先事项。

作者在报告中对威慑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研究如何制定一项威慑战略来认识太空领域的特点以及中国在太空的特定目标。

报告主要发现包括：一项成功在太空实施威慑的方法，需要应对“侵略”的跨领域反应具有可信度和合法性，联盟可以帮助建立这种可信度和合法性。建立行为规范对一项太空威慑战略很重要，建立这些规范的方法需要针对特定的行动者进行调整。由于中国在太空方面的雄心，威慑中国需要给其在太空中采取“激进行动”施加巨大的代价。强调中国自身对天基能力的依赖，应该是量身定制的威慑战略的一部分。

报告提出如下建议：首先，美国应制定一项阻止中国通过太空活动影响美国整体努力的计划。其次，为了制定有效的威慑战略，美国应该降低对干扰天基能力有效性的认定，降低有限使用太空力量将起到威慑作用的想法，并解决美国在太空存在脆弱性。最后，美国应该加强努力，让主要盟国和伙伴参与进来。

华盛顿“基于规则的秩序”存在的问题

美国《外交家》杂志 (The Diplomat) 网站 8 月 3 日载文称，

美国更好地遵守国际规范将极大增强其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能力。文章摘要如下：

“基于规则的秩序”是对世界应该如何运作的一种新颖而模糊的描述。联合国和国际法是更为确定和合法的描述。尽管美国影响了联合国和大部分国际法，但它与这些机构的关系却日趋紧张，尤其是自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这也是美国回归“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部分原因。

在美国从联合国撤退之际，中国却加快了行动。中国是否在利用这种参与来“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研究表明，北京似乎可以合理地声称支持现有国际秩序的许多要素。但其他学术研究表明，中国正在稳步改变国际制度和规范，以符合其偏好并去除自由价值观。然而，即使美国及其盟友能够证明中国是如何从内部改变“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有多少国家会在意这一点也是个问题。

在争夺国际合法性的过程中，美国应该避免笼统而夸张地声称美国遵守而中国违反了“基于规则的秩序”。美国的信息传递得越精准，效果就越好。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通过遵守规则，华盛顿能够为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赢得更广泛的支持。美国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约束并愿意服从，人们对此仍在积极辩论中。但无论如何，美国现在尝试这种领导模式并加强占领道德制高点还为时不晚，而且这种需求正在不断增加。

“邻里联防”策略是否能威慑中国？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 8 月 4 日载文称，考虑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宣称的意图和发挥军事和政治主导作用的能力，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集体安全措施日益紧迫，“邻里联防”（neighborhood

watch) 的方法有益于构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架构。

文章称，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 (CSBA) 最近的一份报告建议采用“邻里联防”方法来协调亚太地区盟友的无人系统和传感器的使用，以威慑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该报告主要涉及技术和战术层面，但它触及了一个对该地区具有更广泛军事和政治意义的问题：多边安全架构是否是威慑中国的最有效方式？若如此，协同监视等方式是否是构建此类架构的好方式？

自二战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关系一直是双边关系，而不是与北约等多边机构挂钩。这样的安排适合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双边关系中最强大的军事伙伴的时代。然而，这样的安排在亚太安全上造成了漏洞，给了中国“可乘之机”。在过去 20 年中，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重心和资源不断下降，北京则奉行“分而治之”的战略，充分利用这些漏洞。因此，要求在亚太地区转向更加集体的安全方式的呼声——类似 CSBA 研究中概述的“邻里联防”策略——并不少见。

然而，过去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防御机制的尝试，并没有给该地区未来的集体防御安排提供多少乐观的理由。例如，东盟 (ASEAN) 已经建立了一个成员国就地区海洋安全进行沟通和一定互操作性的架构，但东盟并非一个集体防御条约，而且美国也并非东盟的一员。

作为扩大多边安全承诺的下一个战术和技术步骤，“邻里联防”策略是有意义的，这是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的一种方法。不过要意识到，没有类似北约那种要求成员国采取集体军事行动的正式规则和结构，一个不正式的“联防监督”协议，在不采取行动威胁的情况下是很难威慑中国的。

约瑟夫·奈：美国应制定战略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中国的崛起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制定一项新的战略，来管理与中国的竞争，以允许在基于规则的体系内开展合作和竞争。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 8 月 3 日登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文章称，中国的崛起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制定一项新的战略，目标不是战胜“生存威胁”取得彻底胜利，而是管理竞争，以允许在基于规则的体系内开展合作和竞争。文章摘要如下：

作为一项美国的大战略，大国竞争有利于美国聚焦对其安全、经济 and 价值观的重大威胁，但它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它把不同类型的国家混为一谈。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美国必须认识到俄罗斯所构成威胁的独特性质。正如一战所显示的那样，一个衰落的大国有时候可能是在冲突中最接受风险的一方。尽管俄罗斯的人口和经济都在下降，但仍拥有巨大的资源，可以在核武器军控、网络冲突和中东等领域充当破坏者。因此，美国需要一个不会将俄罗斯推入中国怀抱的对俄战略。

其次，大国竞争的概念对我们面临的一种新型威胁不够警惕。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安全和全球政治议程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一些政客和分析人士称目前美中形势为“新冷战”，但将美中关系放入意识形态框架，歪曲了美国面临的真正战略挑战。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贸易或社会接触，而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的贸易非常密切，即使打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可能的，也不能使生态上的相互依存脱钩。由于美国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或流行病，它必须认识到，某些形式的权力必须与其他国家一起行使。要解决这些全球问题，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

一个好的大国竞争战略需要详尽的全面评估。低估对手会自满，而高估会产生恐惧。两者都可能导致误判。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在本世纪 30 年代超过美国。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面临着一系列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而且几乎没有政治盟友。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协调政策，他们仍将代表全球经济的最大部分，并且有能力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而影响中国。这种联盟是应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核心。

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战胜“生存威胁”取得彻底胜利，而是实现“有管理的战略竞争”。美国及其盟友要避免妖魔化中国。相反，应该把中美关系视为一种“合作性竞争”，对合作与竞争给予同等关注。在此基础上，只要认识到中美竞争不是二十世纪的美苏大国竞争，美国便可以成功地应对。

美国外交

美在如何应对俄罗斯上缺乏一项连贯的战略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 7 月 27 日登载美国迈克·罗杰斯情报和全球事务中心负责人约书亚·胡明斯基（Joshua Huminski）的文章称，就俄罗斯而言，华盛顿似乎明显缺乏任何连贯的大战略。文章摘要如下：

随着华盛顿和柏林就“北溪 2 号”管道的未来达成协议，华盛顿针对俄罗斯缺乏一项连贯战略的问题变得愈加明显。在冷战时期，美国和北约有一项对抗和遏制苏联的战略；而今天，美国并没有一项可以与冷战时的遏制战略相媲美的战略。

华盛顿必须阐明一个可实现战略，承认这些现实及其政策

工具的缺陷，并确定针对莫斯科可行的最终状态。在此，地缘战略稳定必须是最终结果，并辅以必要的威慑和可能的合作。美国必须与东欧盟国和北约伙伴进行接触，以确保常规威慑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确实存在和可信的。华盛顿还必须与这些盟友合作，打击莫斯科发动的虚假和错误信息，以及非正规战争和政治战争。

毫无疑问，莫斯科将认为这些活动具有煽动性和侵略性。考虑到这一点，华盛顿必须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如战略武器谈判）上展开积极的接触和外交行动。与此同时，白宫和国会必须寻求在制裁外约束莫斯科行为的其他方法。制裁是一项连贯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仅靠制裁是不够的。拜登政府可能希望抛开俄罗斯，专注于国内事务，但忽视俄罗斯问题并不会让其消失。

卡内基：美土需要重新定义两国关系

卡内基欧洲研究所（Carnegie Europe）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访问学者辛纳·吴格（INAN ÜLGENS）的文章《重新定义美土关系》称，为修复美土关系，美国和土耳其应该采取渐进的、具体的步骤来建立信任，并专注于共同议程。文章摘要如下：

冷战的结束以及更加多极化体系的出现改变了美土关系的性质。在华盛顿看来，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如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框架。然而，安卡拉对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亚洲的崛起和中国的优势更多地被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安卡拉和华盛顿在如何看待世界方面的分歧不断扩大。

长期以来，美土关系一直被定义为北约支持下的战略联盟。今天，这个定义已经过时，没有表达这种关系的新现实。毫无疑问，土耳其仍将是一个强大的北约盟友，但它与美国的关系将不

再受这个军事联盟力量不对称的影响。然而，美国不能用对待对手的方法来解决与土耳其的分歧，将协议和合作领域与分歧领域完全分开是不现实的。安卡拉青睐的“大交易”（grand bargain）方式也不会成功。土耳其希望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以灵活的方式商议所有有争议的地区。然而，华盛顿对与埃尔多安政府开展这样一项事业几乎没有兴趣。

可以推动一种逐步和解的方案，以替代土耳其所倡导的“大交易”或华盛顿目前所支持的有原则的接触。逐步和解需要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行动，包括未来与伊朗谈判、重建叙利亚、使利比亚恢复正常等。土美关系迫切需要渐进但具体的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为更积极和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奠定新的基调，并重建互信。

美外交政策专家如何看待“盟友”一词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CGA）网站8月3日登载该智库公共舆论和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西贝尔·奥克塔伊（Sibel Oktay）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对“盟友”一词的看法，以及看法的不同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

文章称，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之初就宣布“美国回来了”，并称美国将“修复联盟关系，再次与世界接触”。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来说，盟友的定义似乎会因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国际关系研究者通常认为盟友是条约盟友。但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表示，以色列也是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和美国没有签署像北约那样的书面安全和防御协议。但是，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战略和经济联系。近年来，美国官员开始将更广泛的行为体称为盟友。如今，有些人会把美国与乌克兰的关系形容为联盟关系。美国甚至

把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库尔德组织称为自己的盟友。

这些最近的事件表明,对一些美国外交政策精英而言,条约盟友或许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么重要。一方面,拜登为参加北约峰会首次出访欧洲,表明美国重视这一联盟;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条约盟友对美国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伊利诺伊大学斯普林菲尔德分校和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先后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或意见领袖中进行了两次实验。数据显示,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对条约盟友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国际行为体。

这对美国的盟友来说是好消息,但这种关系并不是无条件的。国家安全利益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的头等大事,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条约盟友会被放到次要位置。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就是一个例证。一些人认为此举背叛了美国的盟友和价值观,而拜登个人极力强调此举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学者谈美外交政策中的克制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8月9日登载纽约城市学院国际关系教授拉詹·梅农(Rajan Menon)等的文章《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克制——是什么,不是什么》称,如果人们正确理解克制的准则,而非歪曲和讽刺,那么有关美外交政策克制的辩论将更有成效。文章摘要如下:

克制是一个治国方略概念,它挑战了几十年来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克制警示人们不要狂妄自大,并敦促人们保持谦逊,这种观点受到了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影响。尼布尔告诫说,自负的权力和浮夸的自我概念的融合可能导

致灾难，而美国也不能幸免。看看伊拉克战争就知道了。近 20 年过去了，伊拉克战争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民主、人权、经济安全或稳定，更不用说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更大的自由。诚然，大多自由国际主义者并不为伊拉克战争欢呼。但在这件事上，他们的观点主导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考。他们认同新保守主义的看法，即美国的主导地位可以重塑世界。这种千禧年的思维模式激发了一系列社会工程项目，包括推进民主、国家建设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相比之下，克制的支持者则警示人们不要试图重塑美国人知之甚少的政治和社会。他们强调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和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意外。在特朗普竞选总统之前，主张克制的人就批评了伊拉克战争。他们告诫说，虽然美国可以轻易地消灭政府，但它将陷入国家建设的泥潭。

那些赞成克制的人既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孤立主义者。他们明白国家安全面临真正的威胁，其中一些可能需要使用武力。然而，值得争论的不是武力是否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手段，而是使用武力和不使用武力的目的是什么。由于美国在军事力量上投入巨资，却没有受到国会的任何反对，一些克制者批评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普遍外向型思维，这种思维忽略了数百万美国人面临的日常困难，以及国内不断恶化的问题。未能预见到民族主义的复兴、民主的倒退和经济战的复兴，使得自由国际主义——而非克制——过时了。

CSIS 建言加强美菲及美泰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 2021 年初与美国、菲律宾和泰国的专家和实践者举行了一系列非公开的虚拟研讨会，

以为这些联盟当前和未来的状态提供可行动的见解。这些讨论还突出了美菲和美泰关系的政治制约因素，和两组联盟关系的不同。在这些研讨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告为美国在亚洲的参与以及如何加强美菲和美泰关系提出了建议。

对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一般建议

华盛顿的亚洲战略不应该过度反华，而应该是亲亚洲。通过将亚洲定位为一个多极地区，美国能够将经济投资、政治参与和安全合作纳入一个统一的战略，以满足泰国和菲律宾建立“更全面”联盟的优先事项。此外，美国在该地区缺乏高层外交活动。

报告为此建议：第一，美国应考虑加入区域贸易协定，如《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不仅会增加地区的经济活动，同时也表明美国对该地区的长期经济承诺。第二，恢复美泰创造性伙伴关系，增加双边经济活动。第三，建立一个多边对话矩阵，以支撑美菲联盟免受双边冲击。第四，任命一名驻东盟大使，这个职位在特朗普整个任期内都是空缺的。任命美国驻泰国和菲律宾大使，这两个职位目前也是空缺的。第五，寻求更多机会，在华盛顿与马尼拉和曼谷的同行之间开展高级别 1.5 轨和 2.0 轨对话。第六，菲律宾和泰国可就特定问题领域与美国和日本进行三边对话或多边对话。三边和多边框架可以为马尼拉和曼谷讨论敏感问题提供政治掩护。

对美菲联盟的建议

美国与菲律宾的联盟牢固地植根于安全合作，包括在棉兰老岛的反恐行动，但缺乏在其他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美菲联盟缺乏一致和有影响力的对话。此外，菲律宾在海洋领域的感知能力和网络安全能力欠佳，不足以应对“灰色地带”挑战。

报告建议：第一，除了在传统安全事务上继续合作外，探索就共同利益进行政治或经济合作的途径。美国必须塑造菲律宾对

联盟的看法，并强调联盟在安全合作之外给太平洋两岸带来切实利益的方式。第二，增加马尼拉和华盛顿之间 1.0 轨和 1.5 轨对话的深度和频率。这些会谈应该超越传统的国防机构，由外交部和国务院领导。第三，投资与无人机、近地轨道传感器和处理遥感数据的自动化平台等相关的新兴技术。第四，在杜特尔特执政的剩余时期，鼓励更多的空军和海军联合演习。一旦杜特尔特离任，美国必须迅速行动，说服他的继任者全面实施美菲《强化国防合作协议》（EDCA）；在双方商议好的地点进行必要的美国资助的建设，并部署美国的空中资产和远程火力。

对美泰联盟的建议

随着美国和泰国的地区战略不再一致，双边信任已经减弱。美国可以通过重建与泰国皇家军队的信任来加强安全联盟。

报告建议：第一，重申美国对短期和长期安全合作项目和倡议的承诺。双方应加强已建立的短期工作或教育交流等机制。加强禁毒合作，以及在网络、监视和数据分析方面的倡议。第二，增加直接军事援助，可以以与国防有关的新兴技术的形式进行。第三，与泰国支持的“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倡议（ACMECS）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在财政上支持湄公河基础设施项目。第四，向泰国提供更强的数据透明度和情报能力，以监测湄公河流域的水位和其他问题。

美国政治/其他

美如何看待贸易和气候政策的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国际商务高级顾问威廉·赖因施（William Alan Reinsch）的文章称，拜登

政府的早期行动表明其对气候变化的优先考虑包括其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这与美国国会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支持绿色科技和关键产业创新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观点一致。但这种倾斜可能会使就气候贸易政策的共同方法达成国际协议的过程更加困难。

文章称，迄今为止，拜登一直在寻求提供激励措施来实现他的气候政策目标。然而，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若干重大障碍。随着国际参与者开始制定他们的下一代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美国需要探索在国内政治氛围和多边框架下，哪些政策反应最可行。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s）提出了许多衡量和可信度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关于保护主义的基本问题，以及如何按照世贸组织（WTO）的要求使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保持相同的标准以激励企业和公众接受可持续发展，但越权也可能在世贸组织带来法律上的挑战。自由贸易协议（FTAs）可以提高和协调标准，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促进绿色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但拜登政府有责任确保贸易履行其环境承诺。随着政府继续推进其气候议程，它将进一步应对稀土和关键矿物的短缺问题，这使其部署可再生产品和技术的能力复杂化。

当谈到气候和贸易政策的关系时，拜登政府的核心挑战是协调看似矛盾的政策，无论是建立既可持续又有弹性的供应链，在重申全球领导地位的同时向内看，还是说服严重分裂的公众在面临系统性变革时团结起来，同时利用现有的多边规则来阻止气候灾难的发生。

美学者称美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国家海洋战略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网站8月5日登载该智库国防概念和技术

中心研究员蒂莫西·沃尔顿 (Timothy A. Walton) 等的文章称, 美国海军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如不断收紧的预算和崛起的中国。但是, 仅关注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的军事贡献, 忽略了他们如何通过作战以外的其他行动来提升美国国家安全和竞争力。为了发掘这种潜力, 美国领导人需要制定和实施一项全面的海洋战略, 而不是海军战略。文章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 政府应制定、发布和实施一项全面的国家战略, 以培育美国的海洋力量, 加强和提高海洋产业基础的竞争力。这项由白宫主导的新战略应该为加强美国海上力量和利用机会解决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制定一条具体的道路。

其次, 为了支持军事行动, 该战略应该以更高的津贴扩大“海上安全计划”的商船队, 这些商船在和平时期有助于美国的经济活动和影响力, 并准备在危机中支持军事需求。通过这种方法, 国防部可以通过更大的商业船队提供的额外运力, 快速、经济地更换大部分老化的战略海运船。

再次, 除了大型海军舰船, 美国造船业基地在过去 10 年里面临着销售量微薄的局面。为了让造船厂更加稳定, 新的海洋战略应该指导政府对小型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民用船只的订单与商业客户的订单进行协调。修船厂面临着相反的问题, 他们的工作量超出了其承受能力, 而他们对未来的需求知之甚少。该战略应支持海军恢复多舰维修合同, 并辅以贷款担保和拨款, 以改善私人造船厂和供应商的基础设施。

最后, 该战略应该提出计划对过时的税收和法规进行改革, 尤其是与海员工资和维修税相关的法规。这将使美国的运输成本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美专家为如何保护美国的供应链建言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高级研究员马丁·拉瑟（Martijn·Rasser）等执笔的文章称，在过去一年中，供应链已成为全球商业中一个关键且令人不安的脆弱环节。白宫和国会应采取更多措施，以更好地了解 and 解决美国关键供应链的脆弱性。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于今年3月初成立了“国防关键供应链工作组”。该工作组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为国防部提供了可操作的建议，以确保美国国防供应链的安全，并在关键供应链上减少对对手国家的依赖。

工作组呼吁白宫和国会考虑一系列建议以加强五角大楼使用《国防生产法》（DPA）的权力。然而，国会应该走得更远。《国防生产法》可以通过例行的行业调查充当供应链风险的风向标，这是向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有关关键行业、材料和技术的最新数据的理想工具。国会还应依据《国防生产法》第三章（Title III）在商务部下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来扩大《国防生产法》的范围。《国防生产法》第三章授权行政部门使用贷款、贷款保证、购买承诺等激励措施，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所需的投入及时到位。新成立的办公室可以专注于与经济或技术竞争力相关的项目，而国防部将继续监督军事和国防相关项目。

工作组还指出了与盟友合作制定确保供应链弹性的新方法。这符合拜登政府与日本和韩国、“四方安全对话”国家以及欧盟解决供应链担忧的努力。扩大和实施这些协议将需要创建新的协调结构。为此，国会应授权在国务院设立拟议的技术合作办公室，以促进多边努力，实现关键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安全。

供应链脆弱性是全球技术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如何识别和应对这些风险将对美国的长期经济竞争力、政治实力和

军事实力产生巨大影响。美国须在自由市场原则和政府干预经济上穿针引线；在自力更生和国际伙伴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并在对成熟的能力和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进行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美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白人及青年人口下降

近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了 2020 年人口普查结果。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兼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William H. Frey）就此撰文，分析了过去十年间美国人口增速、人种构成、年龄结构和地域差别的新变化，内容摘要如下：

过去十年间人口增速减缓，白人数量下降

本次人口普查 7.4% 的增长率创下了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新低。这与十年来生育率和移民的下降有很大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自 1790 年首次人口普查以来，白人人口首次出现小幅减少。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白人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00 年至 2010 年仅增长 1.2%，到 21 世纪头 10 年则出现了 2.6% 的负增长。除了较低的生育率和移民数量下降，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白人人口的持续老龄化。此外，跨种族婚姻的兴起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混血儿而非纯种白人。

超过四成民众被认定为有色人种

2020 年人口普查体现的一个多样性里程碑是——超过 40% 的美国人现在被认定属于一个或多个种族和族裔群体。美国人口中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有所增加。1980 年，白人居民几乎占全国人口的 80%，非洲裔居民占 11.5%，拉美裔或西班牙裔居民占 6.4%。到 2000 年，拉美裔人口的比例略高于非洲裔：分别为 12.5% 和 12.1%，亚裔美国人的比例已增长到 3.6%，而白人人口比例则下降到 69.1%。20 年后的今天，白人人口比例下降到 57.8%。

拉美/西班牙裔和亚裔人口比例分别上升到 18.7%和近 6%。非洲裔的比例则保持相对稳定。

人口流入/流出呈现出州际和区域差别

尽管总体增长缓慢，但各州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差异很大。十年间有 35 个州的白人人口减少。但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州拉美裔、西班牙裔、非洲裔和亚裔居民数量都有所增加

各种族群体人数增长的州呈现出一定的差别。白人人口有所增加的州位于“阳光地带”，其中以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佛罗里达州为首。相比之下，白人人口减少最多的八个州中有七个都位于东北部和中西部。非洲裔人口的集聚也更偏好以得克萨斯、佐治亚和佛罗里达为首的“阳光地带”。人口减少最多的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和纽约州则是“反向大移民”南迁的发源地。

青少年人口数量在包括 27 个州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呈现减少趋势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在 2010-2020 这十年间，全国 18 岁以下人口（此处称为“青年”人口）总体下降。在一个快速老龄化的国家，青少年绝对人口的减少代表着未来的人口挑战。

过去十年间，青少年人数超过 100 万的减少与过去 20 年的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婴儿潮一代的大量人口未满 18 岁，占总人口的 35%。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例下降到 22%。在很多地区，青少年人口减少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有 27 个州的青少年绝对人口数量出现了下降，东北部尤甚。这意味着总体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年轻人所占的比例较小。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